

《西域水道记》稿本研究

朱玉麒

2002年3月,有史以来规模最为庞大的百科性质丛书《续修四库全书》(以下简称“《续修》”),在经过八年的编纂整理之后,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全部出齐。它是继18世纪乾隆编修《四库全书》以来又一次全国范围内对中国古典文献进行的大规模清理与汇集。《续修》精装1800册,总共收书5213种,全部使用最佳的版本影印。这种存真的方法,比之《四库全书》为世人所诟病的抄写、避讳而对原书有意无意的改变来说,无疑是最为嘉惠学林的功德。因此,围绕着《续修》的出版,将会从许多方面留下它在中国出版史上的研究内容。而在版本目录学上,“《续修四库全书》本”这样一个概念也将不断被引述。

一、《续修》所用之《西域水道记》稿本

《续修》本中最为集中的一部分图书,是乾隆以来清代学术最令人瞩目的“乾嘉学派”学者的成果。徐松(1781-1848,字星伯)是嘉道之际著名的学者,是乾嘉朴学具有经世学风的转关之际重要的领军人物。他在西北史地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屡为后世所称道,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论说:“边徼地理学,虽由考古引其端,而末流乃不专于考古,盖缘古典中可凭借之资料较少,而兹学首倡之人如祁鹤皋、徐星伯辈,所记载又往往得自亲历

也。”^①作为西北历史地理学的创始人徐松,他在方法论上注重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察的结合,使传统的沿革地理具有了现实的观照;其《西域水道记》因而成为乾嘉学术“由死学转为活学”的代表作,且至今仍是西域史地研究的重镇。《续修》本《西域水道记》影印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藏稿本,收入该丛书第728册“史部·地理类”(73-154页),它的印行,为我们提供了道光刻本以外的另一重要版本,对《西域水道记》的成书研究及文字校勘,都是极有价值的文献。

二、《西域水道记》稿本的写定年代

《西域水道记》最为通行的版本,是道光年间的刻本。因为得到两广总督邓廷桢的帮助,《西域水道记》在道光十七年末至十九年末之间(1837-1839)付梓^②。该书在徐松遣戍伊犁时期(嘉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1812-1819)就已完成了初稿。其友人龙燮堂(字万育)在道光三年(1823)为《西域水道记》所写的序文记载:

嘉庆丁丑岁(二十二年,1817),谪戍伊犁,与旧友太史徐星伯先生比屋居,见先生所撰《伊犁总统事略》及《新疆赋》、《汉书西域传补注》,叹其赅洽。先生又出其《西域水道记》草稿数卷。余方为逋书,而先后赐环归京师。松湘浦先生奏进先生所撰《事略》,御制序文,付武英殿施行。好事者又争为刊《新疆赋》、《汉书补注》,将以次开雕《水道记》。先生以此记定本余手写也,因问叙于余。

序文所及徐松的亲笔草稿数卷似未保存下来。目前能够看到的最早稿本就是《续修》本影印的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水道记》四卷本(编号SB3869)。原书版框高231毫米、宽302毫米,四周单栏,无格,半叶十二行、行三十三字,小字双行夹注,与目前留存下来的徐松原藏《新疆赋》、《汉书西域传补注》的稿本从用纸到字迹都同出一辙,但它不是徐松的恭楷笔迹,而是倩人誊写的^③。在该稿本的眉

端、行间,间有徐松修改、补充的行书笔迹,卷一首叶与卷四末叶均钤有“星伯审定”的白文方印。因此,该本的确切版本称谓应该是徐松手定底稿本(在本文的讨论中,仍简称“稿本”)。

根据其稿本的文字内容,可以判定其写定年代应该在作者从伊犁赐环回到京师之后的道光二年至六年之间(1822-1826)。在稿本中,使用了《长春真人西游记》的文字五处,据缪荃孙辑录的《星伯先生小集》所收《长春真人西游记跋》一文中记载^④:“适从龚定庵假读此记,西域余所素经,识其相合者如此。道光二年四月大兴徐松跋。”可知徐松读到《长春真人西游记》的时间是在返京以后,因此稿本中既然引用了《长春真人西游记》的材料,可以推断它是在赐环归京的道光二年后誊抄的。稿本的下限,同样也可以通过徐松藏书的情况来作出判断,在《星伯先生小集》中写于道光丙戌(六年,1826)十一月的《华严音义跋》里,记录了徐松得到《华严经音义》一事,因此他看到该书最晚的时间就是在写跋语时。在《西域水道记》刻本的卷一有两段夹注引用了《华严经音义》的注文,但这一内容在稿本中是没有的,所以稿本写定的时间应在道光六年之前。

三、《西域水道记》稿本与通行刻本的区别

《西域水道记》从稿本的写定到刻本的印行,中间至少有10年以上的时间,按照徐松著述锲而不舍的特点,他无疑充分利用了这10多年的时间进行修订。比较稿本与刻本,可以看出作者在著述过程中认识上的发展。

一是卷数从四卷发展为五卷。这主要是由于反映天山南路“罗布淖尔所受水”内容的扩充,而使之从稿本的一卷发展为刻本的两卷所致。罗布淖尔接受了来自昆仑山北和天山南麓的水系,同时又被清代再度钦定的“初源说”所纠缠,平定大小和卓木、乌什事件等当代史的内容也使其头绪纷繁。作者不被文字均衡的写作定势所

束缚,将罗布淖尔三源所包括的塔里木盆地西部作为第一卷,自三源合流后的东部作为第二卷,显然是合乎历史与地理发展逻辑的。

二是重绘每卷之后的地图(刻本卷一后无)。这无疑是由于徐松在京师得到更多的机会与专精天文、历算和地理等各个方面知识的友朋切磋,并能够读到大量前此未见之资料,从而具有更为精确的地图观念所致。这一点,我们通过刻本对稿本在作为定点的一些山川、聚落经纬度的修改和补充上,就可以看出其必须重绘地图的原因。如卷一的冈底斯山,稿本作“偏西三十六度四分、极出地三十度五分”,刻本作“当京师偏西三十七度五十分、极出地三十四度二十分”;卷二的罗布淖尔,稿本作“偏西二十八度至二十七度、极四十度至五分”,刻本作“极四十度三十分至四十五分、西二十八度十分至二十九度十分”。在作者文字标出的60个经纬度地点上,从稿本到刻本大多发生了改变,许多既不同于当时权威的《水道提纲》、《钦定西域图志》和《钦定河源纪略》,也与《乾隆内府舆图》所标不完全一致,这可能是他得到了当时更为精确的测量资料。

三是许多考证都得到了新的材料补充或修改。如,《西域水道记》非常重视出土文献(即碑刻)与传统史料印证,在刻本卷三敦煌一地中录有五方碑刻文;但在稿本中只有《唐李府君修功德碑》、《唐李氏再修功德碑》二方,重要的碑刻《周李君重修莫高窟佛龕碑》、《元至正造像记》、《唐索勋纪德碑》三方都是在刻本中新加的。又如刻本卷二讨论额尔勾河即古“计戍水”一条,补充了唐代阙啜忠节送唐御史中丞冯嘉宾于计舒河口的材料。再如卷一回回历、卷四海都地问题,都有新材料给予了修改。

因此,如果当年真的在道光初年稿本的基础上刻印《西域水道记》的话,势必会失去许多令该书生色的精彩考证。

四、《西域水道记》稿本的校勘价值

如上所述,比较稿本与刻本之不同,使我们窥见成书过程中作

者的思考与认识发展,以及得到友朋帮助而进一步完善的内容。在笔者整理《西域水道记》并进行的点校过程中,对稿本与刻本的不同与增补情况,都给予了反映,相信它能够更直接地将这种改变体现了出来。

除了这种帮助我们了解该书写作过程的意义之外,稿本对刻本内容的讹误纠正也是值得注意的。虽然我们强调从稿本到刻本的质量提高是毋庸置疑的,但在点校过程中亦发现有许多地方稿本可帮助我们纠正刻本中的误植之处。兹将得到稿本证明而作出的订正列举数例如下(例证中之底本即指刻本,稿本用《续修》影印本):

卷一“乌兰乌苏河”下:“经霍尔干庄北(在喀什噶尔城东北三十里)。”按,“东北三十里”,稿本作“北五里”,是,底本涉下“伯什克勒木庄”下“在喀什噶尔城东北三十里”而误。

卷一“泽普勒善河”下:“又西四日程,曰博洛尔,其地南即巴勒提。”按,“即”字,稿本作“接”,是。

卷二“三源既合”下:“乾隆二十七年,素诚赴乌什办事。”按,“诚”,底本作“城”,据稿本改。

卷二“《水经注》曰:‘其水屈而南,迳渠犁国西。’”按,“水经注”,底本作“水经”;“南”,底本无此字,均据稿本补。

卷三“《唐李府君修功德碑》”下,“虚谷腾声,洪钟应物。”按,“腾”,底本作“胜”,据稿本改。

卷四“吉勒苏胡岭”下:“岭高数里,悬崖耸峭,危石倚空,哈什洪涛,冲啮其趾。”按,“高”字,底本作“南”,据稿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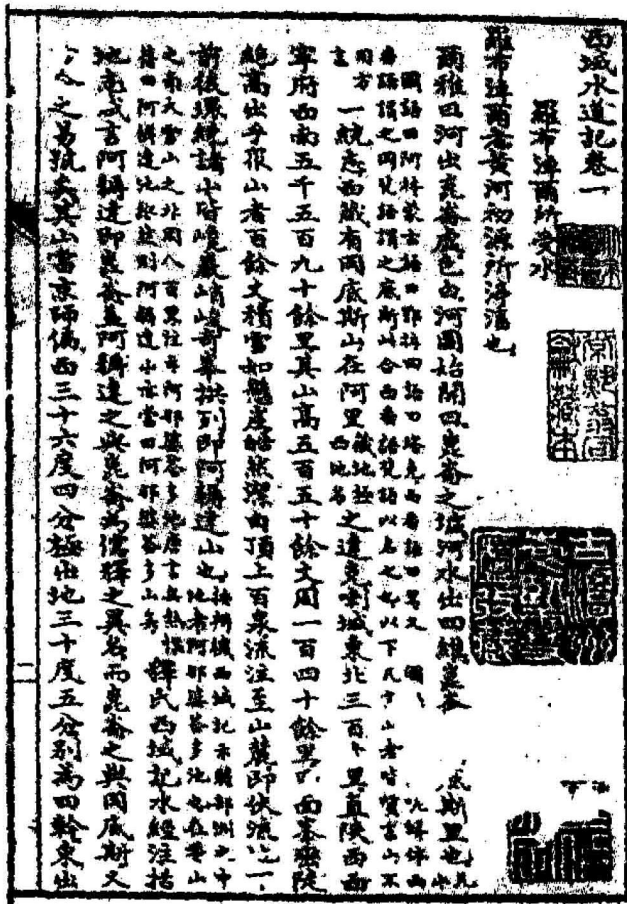
卷四“麓有碎石,抔结坚实”,抔:底本作“搏”,据稿本改。另外,在稿本的大部分文字上,都有徐松用硃笔所做的句读,这在点校过程中,也对原文的理解有不小的帮助,如卷一“乌兰乌苏河”下:“南渠溉塞尔们庄,经城西,南入于河”,如果没有硃笔句读的指引,就可能标点成“经城西南,入于河”。又如对于西域音译的人名、地名并列情况,稿本《西域水道记》往往夹有小字“句”字间隔,如卷

一“葱岭北河”下：“军机大臣议：回部设立阿奇木共三十一城，计其大小，酌为三等：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和阗为四大城，乌什、英吉沙尔、库车、辟展为四中城，沙雅尔、赛喇木、拜、库尔勒、玉古尔、牌租阿巴特、塔什巴里克、哈喇哈什、克勒底雅、玉陇哈什、齐尔拉、塔克、阿斯腾阿喇图什、阿尔琥、玉斯屯阿喇图什、英额齐盘、巴尔楚克、沙尔呼勒、鲁克察克、托克三、喀喇和卓、洋赫、克勒品为二十三小城，俱给阿奇木伯克图记。其分寸，大城视内地佐领，中小城递减。”像这样一些汉字音译而难于标点的地方，硃笔句读也很快帮助我们进行了准确的判断。

五、《西域水道记》稿本的递藏

《西域水道记》稿本今藏国家图书馆，其间递藏，根据藏书印可得其大概。目前所见的稿本第一册卷一首叶钤有“星伯审定”白方、“古潭州袁卧雪庐收藏”白方、“常熟翁同龢藏本”朱长方、“北京图书馆藏”朱方四印，此外，卷四地图的最后一叶A面，也钤有翁同龢“均斋秘笈”朱长方、“虞山翁同龢印”白方两印，它们指示了该书由徐松—袁芳瑛—翁同龢—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的递藏经过。而这也是徐松大量藏书（包括其著作）在身后递藏的历程，因此在这里提出来分析。

徐松的藏书身后散落，在缪



《续修四库全书》影印《西域水道记》稿本首页

荃孙《星伯先生小集跋》中已经提及：“（徐松）子延祖先歿，家亦中落。藏书万卷，大半斥卖。”临近徐松住宅而曾经是他藏书来源的琉璃厂书肆，此时显然以雄厚的实力与丰富的经验成为这批藏书的优先购买者。通过这一中介，徐松的藏书陆续流散出来，当时身居京师的藏书家袁芳瑛成为最大的买家。芳瑛字漱六，生卒年不详，湖南湘潭人，道光二十三年（1843）举人，二十五年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后升御史，出为松江知府，卒于官。袁芳瑛以藏书名世，黄濬称之为“近代第一”^⑤，叶德辉则誉之为咸丰时东南藏书三大家之一，认为：“袁氏得之兰陵孙氏祠堂者十之三，得之杭郡故家者十之二，得之官编修时者十之四五。”（《结一庐书目》重刻序），而徐松藏书的散出正在其任翰林编修期间，故近水楼台，所得最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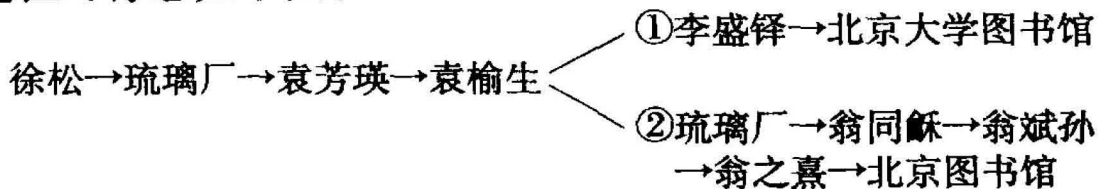
关于袁芳瑛藏书的流散，也以黄濬《花随人圣盦摭遗》“袁漱六藏书散佚无存”条记载最详。其中记载袁氏卒后，藏书载入湘中，其子榆生无故书雅记之好，以五间楼房闭置，积年不问。光绪五年（1879），李盛铎（1859—1937）之父李明墀（1823—1886）任湖南巡抚，盛铎随宦湘中，得以设计从榆生处购得大量珍本，入藏其木樨轩中。这批藏书中就有徐松的旧藏如《唐两京城坊考》稿本、《新疆赋》稿本、《雪矶丛稿》钞本等，在李盛铎去世之后，它们随着木樨轩五万多册的藏书归藏北京大学图书馆，这成为袁氏旧藏徐松书籍的重要传递过程之一。

在李盛铎之后，袁榆生又将其父藏书再度辇至北京琉璃厂出售，在缪荃孙的《河南志跋》中有相关的记载：

光绪壬申（按，光绪无壬申，当为甲申，即光绪十年，1884），袁漱六前辈卧雪庐藏书辇来厂肆火神庙，名钞旧校，触目琳琅，而值极昂。荃孙境又极窘，无计得之，又不能自己（已），心跃跃然，目炯炯然，逐日蹒跚书城之侧，寝食俱废。见友人中能得者，则谨志之，为他日借阅地。一日，见《河南志》钞

本一巨帙,无卷数,用《全唐文》格子,封面题《河南志》,识是徐星伯先生手笔。城池宫阙,自周至唐悉具,知是宋次道《河南志》之首册,而星伯先生修《全唐文》时所录者。议价不成,次日即为人购去,懊恼欲绝。后探知归常熟师所,因乞归录副而细校之。^⑥

跋中所云“常熟师”即翁同龢(1830-1904),字叔平,号松禅等,江苏常熟人,咸丰六年(1856)状元,官至协办大学士,为同治、光绪两朝帝师。从其父翁心存(1790-1862)起,即嗜藏书。这里讨论的《西域水道记》稿本,还有《汉书西域传补注》稿本,与跋中所记《河南志》钞本一样,都是翁氏在袁芳瑛藏书流落京师琉璃厂时用重金购得的徐松旧藏。戊戌变法时,翁同龢被开缺回籍,其京师典籍由侄孙斌孙继承,后移置天津。斌孙卒后,则由其二子之廉、之熹继承;之廉卒,又由之熹独守典藏。在新中国建立后,之熹将部分善本捐赠北京图书馆,上述三种徐松旧藏亦因此皮于国家图书馆^⑦。此即袁氏旧藏徐松书籍的重要传递过程之二。袁氏旧藏徐松书籍的递藏过程可标志如下图:



《西域水道记》稿本的递藏详细过程就是上列第二种。

六 《续修》本省略的《西域水道记》稿本浮签

《续修》影印《西域水道记》稿本,使它化一为亿,起到了典籍保存的功能,但是略感遗憾的是,《续修》本《西域水道记》省略了附在原稿本中间的大量浮签。

《西域水道记》稿本在道光初年写定,大概是因为当时曾经有过刻印的可能,所以作了誊清;但似乎刻印的目的又未能马上得到实现,便延搁了10多年。而这也给了徐松进行修订的机会,因此在

稿本中夹了许多的签条,补正写定的稿本内容。据笔者对于原本的调查,有41条之多。这些签条,在后来的刻本中基本上都已纳入,但也有个别的不同。如稿本卷一38A下引岑参《题铁门关楼》、《宿铁关西馆》二诗,在刻本中仅云“唐岑参有《题铁门关楼》及《宿铁门关西馆》诗”。又如稿本卷四有两条有关俄罗斯的内容,在签条均注云“据余理初所辑”,即俞正燮《俄罗斯事辑》,其中一条又有“存以俟考”的注,最后在刻本中未收。这种不同可以看作是在最后定稿时作出的修改。《俄罗斯事辑》载入道光十三年(1833)由张穆、许瀚编排并在京付刊的俞正燮《癸巳类稿》卷九中,由此可以看出稿本签条有道光十三年之后新增加的内容。

在签条中更为重要的信息是“沈抄本”一词的出现。该词凡两见,一处是前揭稿本卷一38A引岑参《题铁门关楼》、《宿铁关西馆》二诗下,有“沈抄本已添”字样,一处是卷一40B“嘉勇公”条下,有“沈抄本未添”字样。无论“已添”、“未添”,最后在刻本中都已补入,因此它是徐松在增补稿本内容时为了记住与另一个“沈抄本”之间的同异而做的记号。而这个“沈抄本”,应该是帮助他进行增订的沈垚的抄本。

沈垚(1798-1840),字子敦、子惇,浙江乌程(今湖州)人,道光十四年优贡生。他因《新疆私议》一文表现出对西域地理的卓越见解而为徐松所赏识,从道光八年之后两人开始有关这方面内容的通信。道光十五年,沈垚入京应考,遂被徐松邀住在家,帮助编纂包括《西域水道记》在内的地理著作。但在第二年,沈垚移居内城姚元之处;为继续帮助徐松进行《西域水道记》的修订工作,他又抄写了一个《西域水道记》的本子,然后两人分头订补;当他从内城“间旬相访”(张穆《落帆楼文稿序》)宣武门外的徐松时,再进行探讨。从稿本到刻本之间一些比较大的行文差别来看,刻本的底本应该是从稿本过录又加上了沈垚修订的“沈抄本”。沈垚在进行《西域水道记》修订的过程中,也完成了如《元史西北地蠡测》二卷、《西游记金

山以东释》一卷、《西域小记》一卷等著述,后被收入他的《落帆楼文集》中。

这些签条笔迹不同,大多数可以判断出自徐松手笔,另一些则可能是帮助校勘整理者的笔迹。它们原来都粘贴或附夹在需要补正的相关叶内(至今仍有因粘贴太紧而未能揭下者,见《续修》本79页上右、91页下右),但当徐松去世、藏书散出之后,大概为了防止这些浮签的丢失,它们被书商或收藏者揭下汇集在一起,按册分成了四份,并且在签条的后面都写了数字表明其所在的叶码。而在做此事之前,那些签条显然已经被人挪动,以致这些原排顺序所标叶码和卷数与实际应贴附的位置多不相符,难以复位。笔者在点校《西域水道记》的过程中,根据其文字内容,重新排定了它们在稿本中的实际卷叶顺序,兹附录如下,同时也将签条全文录出,以与《续修》本配成完璧,提供给研究者。

附录:《西域水道记》稿本签条及顺序对照表

序数	稿本签条 (括号内文字原系小字夹注)	原排顺序 (卷/叶)	实际顺序 (卷/叶)
01	赐环归京师。松湘浦先生奏进先生所撰《事略》,御制序文,付武英殿施行。好事者	2/17	卷首龙序,稿本今无。
02	准此论之,计三十年应有一万六百三十一日,则一千二百三十三年积四十三万六千九百三十四日又十分日之一,以回回岁实三百六十五日一百二十八分之三十一,约之得一千一百九十六年又一百四日半弱。从嘉庆二十四年六月初二日逆数之,当托始于唐高祖武德六年三月初三日也。其字曰哈	1/9	1/9A
03	出喀什噶尔境。唐景龙二年,突骑施酋长娑葛入寇,五千骑出安西,五千骑出拨换,五千骑出焉耆,五千骑出疏勒。郭元振在疏勒,栅于河口,不	1/11	1/10B

	敢出,疑即斯河也。牌租阿巴特河又东一百里,至托克察哈尔地。又东九十里,至伊米什地。又东八十里,至阿克察哈尔地。又东八十里,至沙瑚尔地。其南岸,伯斯罕沙磧也(元人谓沙磧为沙陀,今蒙古语曰戈壁。下皆质言沙磧)。又东九十里,至玛拉尔巴什庄北。		
04	至噶巴克阿克集。其地极四十四度二十五分、西三十六度三十分。《河源纪略》云	1/12	1/11B
05	今正为叶尔羌。《元世祖纪》:“至元十一年春正月,立于阾、鸦尔看两城水驿十三,沙州北陆驿二。”《曷思麦里传》:“哲伯令曷思麦里持乃蛮主曲出律首往徇其地。若可失哈儿、鸭儿牵、斡端诸城,皆望风降附。”鸦尔看、鸭儿牵,即叶尔羌音之转也。《一统志》	1/11下	1/11B
06	西源出喀楚特城南大山,源处极四十一度五分、西四十三度三十分,东北流二百余里,有齐齐哈尔岭水南流百二十里、经塞勒库勒庄东来汇。塞勒库勒在叶尔羌城西八百里,为外藩总会之区。	1/13	1/12B
07	二十七两七钱。西源折而东南流,有水经羌琿山东来汇。又东,迳托里布隆之南,是曰托里布隆河。托里布隆河东南流百余里,折而东北,又折而西北,凡数百里,迳密尔岱山之北。(密尔岱)	1/14	1/13B
08	高二尺许。托里布隆河又折而东北流,迳英额齐盘山北	1/15	1/15A
09	东源出库克雅尔山(回语库克,青色,山色青,下临坎,故名),在和阾西,与其南山属。水自山出北流,有一水自西来汇,东源又北流二百余里,至沙图城北	1/16	1/16A
10	或即听杂阿布坎? 源处极四十度三十分、西三十九度五十分。听杂阿布河又东北流	1/17	1/16B

11	译言地乳也。《元史》亦曰:于阗又曰斡端。《暗伯传》:尝亲迎于敦煌,阻兵不得归,乃客居于于阗宗王阿鲁忽之所。世祖遣薛彻干等使阿鲁忽以通好,阿鲁忽留使者数年不遣。暗伯悉以己马驼厚赈之,令逃去。薛彻干等得脱归,具以白世祖,世祖叹久之。既而命元帅不花帖木尔征于阗,暗伯乘间至行营,见薛彻干于帐中。薛彻干曰:“公之忠义,已上闻矣。”不花帖木尔遂承制命暗伯权充枢密院客省使。俄有旨护送暗伯妻子来京师。按,阿鲁忽者,察合台太子之孙、合剌旭烈大王之子、威远王阿只吉之兄、太祖之曾孙也。阿鲁忽称于阗王,则于阗者,阿鲁忽分地也。纪传屡言征斡端,征阿鲁忽耳。阿鲁忽亦作兀卢。《旦只儿传》:至元十九年,从诸王合班元帅忙古带军至斡端,与叛王兀卢战,胜之。《拜延八都鲁传》:至元十六年,兀浑察从大军征斡端。《刘恩传》:进兵斡端,海都将玉论亦撒率兵万人迎战,游骑先至,设伏以待,大败之。《世祖纪》:至元十六年九月,以忽必来别速台为都元帅,将蒙古军三千人、河西军一千人,戍斡端城。十七年九月,也罕的斤进征斡端。二十年三月,遣阿塔海戍曲先,汉都鲁迷失帅甘州新附军往斡端。二十三年正月,立罗不怯台阇斡端等驿。二十四年正月,以钞万锭赈斡端贫民。二十五年七月,命斡端戍兵三百一十人屯田。二十六年九月,罢斡端宣慰司、元帅府。《仁宗纪》:延祐六年三月,斡端地有叛者入寇,遣镇西武靖王搠思班率兵讨之。是在元时,屹然重镇。地有六城,	1/19	1/19B
12	出水分流。其源处极四十一度二分,西三十七度四十分,出谷而会,	1/19下	1/19B
13	玉陇哈什,《元史》作玉龙杰赤,《太祖纪》“十六年,	1/20	1/20A

	皇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分攻玉龙杰赤等城”是也。其河亦二源,西源出哈朗归山(东北距额里齐城二百八十里),东源出雪山,源处极四十一度十分,西三十七度。二源既会		
14	辖回庄十一(圣制诗注作三十二)。极四十一度,西三十六度五十五分。哈喇哈什城在其西北七十里,极四十一度十五分、西三十七度十分。	1/35	1/21A
15	哈喇哈什河、玉陇哈什河各东北流,二百余里而合。又东北,迳卡塔里齐山之东。又东北,迳塔克三克尔之东。又东北,迳巴什博克邑之东地。皆沙碛也。合流凡四百余里。又东北,与西来之喀什噶尔河、叶尔羌河会。《汉书》曰	1/21下	1/21B
16	(明《华夷译语》冰曰莫勒孙,即木素之转音。)	1/27下	1/28A
17	(乾隆二十二年,西师致讨,祭额林哈毕尔噶山文曰:“朕寅绍丕基,辑宁函夏。荷百灵之效顺,美报必伸,当万里之奏功,明禋咸秩。惟神遐荒迥峙,灵应夙昭,高埒天山,远通月蝕。属当逆贼阿睦尔撒纳负恩狡叛,窜迹侨栖,收拾残黎,诱招诸部,复鸱张而起事,旋蚕食以逞谋,游牧至斯,披猖寢甚,邻近皆潜。为乌合逆酋,渐欲肆螳当。已而王旅骤加,贼军辄骇,四山草木,尽助声威,诸岭风云,俱增叱咤。奔鹿遂不遑择荫,穷鱼乃自绝游魂。虽追蹶逋逃,又阅时而竣事;而摧拉枯朽,实从此以振威。信乎奉天讨以出师,明神咸祐;兹者蕝武功而底绩,秩祀宜申。用昭右序之文,遣祠官而致享;永作西陲之镇,巩边圉以救宁。”二十七年,秩于祀典,每岁致祭。其文曰云云。中允饶学曙之词也。)	1/35	1/35A
18	(惟神保障遐方,奠基西土。层峦内供,在漠南绥靖之前;协气遥迎,溯阊外奋扬之日。逐飞廉于塞外,八公之草木皆兵;示象鼎于寰中,九牧之神	1/36	1/35A

	奸悉化。辑宁有地,报享宜颁。朕底定荒陬,又安绝域。怀柔所及,龙堆尽列于版图;抚馭攸加,月窟咸通于声教。叛酋溃窜,头屡触于不周;胜旅先登,尸遂陈夫贰负。稽肤功之迅奏,实灵効之克彰。用奏明禋,永垂嘉典。峙金方而作镇,著神功于华岳以西;表翠嶂以为屏,秩祀典于流沙之外。尚期出云降雨,远敷惠泽于边疆;惟兹酌醴牵牲,敬念普存于民力。神其来格,鉴此苾芬。)		
19	(天山蜿蜒数千里,凡今新疆北路之南面大山,皆可谓之天山。而《汉书》屡言天山,则其时必举一主峰名之。晋灼、颜师古不能实指其地,《唐书·地理志》亦两歧其说。证以《汉书·匈奴传》、《西域传》,盖其时所谓天山,即今之博罗图山。山在焉耆国之北,故又曰焉耆山。《太平御览》引《西河旧事·匈奴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焉支为焉耆之通借,祁连与焉耆并举,正以互文见义,非祁连山之外别有焉耆山也。蒙古语谓天为腾格里,西域有腾格里山,今时指为天山主峰,亦非《汉书》之天山也。说详余《汉书西域传补注》。)	1/37	1/37B
20	唐人谓之铁门关,亦曰铁关。岑参《题铁门关楼》诗云:“铁关天西涯,极目少行客。关门一小吏,终日对石壁。桥跨千仞危,路盘两崖窄。试登西楼望,一望头欲白。”又《宿铁关西馆》诗云:“马汗踏成泥,朝驰几万蹄。雪中行地角,火处宿天倪。塞迥心常怯,乡遥梦亦迷。那知故园月,也到铁关西。”盖唐时置桥以度,今不知其迹。(沈抄本已添)	1/38	1/38A 刻本无 诗歌内 容
21	吐鲁番镇城西南九百余里。吐鲁番者,元时火州地。《元史·地理志》作合刺火者,《阿术传》作哈刺霍州,他纪传作合刺和州,亦作哈刺火州。《巴	1/39	1/39A

	而术阿而忒的斤传》:交州即火州也,统别失八里之地,北至阿术河,东至元敦甲石哈,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曾孙火赤哈儿的斤嗣为亦都护。至元十二年,都哇卜思巴等率兵十二万围火州,声言曰:阿只吉奥鲁只诸王以三十万之众犹不能抗我而自溃,尔敢以孤城当我锋乎?亦都护曰:吾闻忠臣不事二主,吾生以此城为家,死以此城为墓,终不能从尔也。受围凡六月不解。都哇以书系矢射城中曰:我亦太祖皇帝诸孙,何以不附我?且尔祖尝尚公主矣,尔能以女与我,则休兵。不然,则急攻尔。其民相与言曰:城中食且尽,力已困,都哇攻不止,则相与俱亡矣。亦都护曰:吾岂惜一女,而不以救民命乎?然吾终不能与之相见。以其女也立亦里迷失别吉厚载以茵,引绳坠城下而与之,都哇解去。其后入朝,还镇火州,屯于州南哈密力之地,兵力尚寡。北方军忽至其地,大战斗力尽,遂死之。子纽林的斤遂留永昌。按,回纥衙帐本在元之和林,唐末回纥衰弱,转徙高昌,后役属耶律大石,元太祖时最先纳土,而犹君长其地,逮火赤哈儿的斤入朝,还屯哈密力。考至元二十年四月,立别十八里和州等处宣慰司,则火赤哈儿之不还火州,殆以朝廷设宣慰司故也。既又为叛王所杀,回纥于是遂亡。吐鲁番镇城曰广安,唐之安乐城。其东七十里为元火州治,今曰喀喇和卓。又东五十里曰鲁克沁,东汉之柳中城也。广安城西二十里为汉交河城。准部之强,地为所有。康熙六十一年		
22 见插图	嘉勇公于五十七年奏言:“臣于上年十二月二十三、四等日,经过鄂凌、扎林淖尔、星宿海、博勒齐尔喇嘛托罗海等处地方,系黄河发源之地,数百里内溪涧交错,泉水甚多,冬令处处凝冰,远近高	1/40	1/40B

	下,竟无路径。”长公亦每为余言其时策骑以行,至鄂敦塔拉,则池冰如镜,粲然遥列,不识其数。(此条“逾星海”下。沈抄本未添)		
23 见插图	凡千六百余里,迳山之东麓,迄于克侍渡口。山即古大积石,今曰大雪山(此即《汉志》“金城郡河关县”下所云“积石山,在西南羌中”者也,自章怀太子注《后汉书》,误认龙支县之小积石为《禹贡》之积石,杜佑踵其谬,至蔡传沿以释经,而大小积石合而为一矣。小积石山在今甘肃河州西北七十里,山之西北百二十里为积石关)。	1/40	1/40B
24	振下是“字”字 增祖 暉归 州犹 方佩隼 □深特达当是子云特达	2/11	2/10A 2/10A 2/10A 2/10A 2/10B 2/11A
25	(《西行纪略》)焕彩沟三字,立石路侧,理藩院笔帖式正书,填以朱,其石亦汉碑。石之阴隶书四行,首行曰“惟汉永和五年六月十五日(下缺)。”二行曰“臣云中沙南侯”,余皆不可辨识。焕彩沟又五里,为南山口	2/17	2/17A
26	哈木哈玛尔淖尔矣。淖尔正南隔山为哈密界,汉之伊吾也。《通鉴》:“魏永平元年,高车王弥俄突与柔然佗汗可汗战于蒲类海,不胜,西走三百余里。佗汗军于伊吾山北。”按,高车所遁,盖今色毕、噶顺两沟之间。其中有白山子径道,南通陶赖军台,即伊吾山北。淖尔北三百余里	2/20	2/19B
27	长六尺六寸八分。其地疑元之彰八里也(《元史·地理志》“畏兀儿地第三十六”曰:“彰八里,至元十五年授朵鲁知金符,掌彰八里军站事。”按,彰八里亦作昌八里,亦作掺八里。《耶律希亮传》:	2/21	2/20B

	“中统二年,至昌八里城。夏,逾马纳思河。”是昌八里在马纳思河之东也。《李进传》:“至元十九年,命屯田西域别石八里。二十三年秋,海都及笃娃等领军至洪水山,进军溃,被擒,从至掺八里。”是掺八里在别石八里之西也)。河经县城东八里		
28	北流至县北。沿河左右,悉为民田。又西北流百五十里,与乌兰乌苏河会。水草所交,莫测远近,群雁止宿,恒亿万计。《元史》云云	2/23	2/23A
29	与乌兰乌苏河会。水草所交,莫测远近,群雁止宿,恒亿万计。《元史·耶律希亮传》:“中统二年,逾玛纳思河,抵叶密里城。”余数渡斯河	2/23	2/23A
30	苏海图(准语苏海图,有怪柳处。)	2/23	2/23B
31	察哈尔为蒙古强部,或谓是元之苗裔。按,《元史·忙哥撒尔传》云:“忙哥撒尔,察哈札刺儿氏。曾祖赤老温恺赤,祖捌阿,父那海,并事烈祖。”是察哈尔之有部落,在有元建国之先矣。其汗曰林丹,虐其部人,天聪六年征之。林丹汗渡黄河西奔,死于锡喇伟古尔之大草滩。八年,其宰桑及其妃墨尔根降。九年,其妻苏泰福晋及其子额哲内附,于张家口外设都统辖之。其游牧在京师西北四百三十里,当直隶、山西边外,左右翼各四旗。其界北至内蒙古之阿巴哈纳尔右翼旗、阿巴噶右翼旗、苏尼特左右翼旗、四子部落旗,西至内蒙古之喀尔喀右翼旗、茂明安旗,东北至内蒙古之克什克腾旗,南至直隶口北三厅、山西大同府、朔平府、归化城。乾隆二十九年,自其游牧移官兵千八百三十七人	2/28	2/27B 共二纸
32	《后汉书·郡国志》“广陵郡”:“东阳刘昭云:县多麋。”引《博物志》云:“十百为群,掘食草根,其处成泥,名曰麋疃。”斯之鹿圈,盖其畴欤?	4/7	3/7B 此纸两 则,第二

	《释名》:“水洗出所为泽曰掌。”《段解》一上云:“水渟处如手掌中也。”		则刻本无。
33	为撒玛勒河源,源亦发自北山,谷长百里,流泚涓涓,当暑清凉,草深没马。水出谷南流(云云)	4/26	3/26A
34	三十二年,阿布赉遣都拉特柯勒奉表至伊犁乞师二万人,并假大炮,将大举伐霍罕。将军不许,其后霍罕仍取塔什罕城焉。哈萨克部凡三,曰左部(亦曰东部)、曰右部(亦曰中部)、曰西部。左部置汗一,今曰斡里,始归顺之汗阿布赉子也,乾隆四十七年嗣。其所辖卫逊诸鄂拓克附崕郭罗鄂伦及鄂尔果珠勒卡伦在伊犁西,素宛鄂拓克附沁达兰卡伦在伊犁北,为最近,阿塔海瑚兰素诸鄂拓克去伊犁为远。右部置汗一,今曰托霍木,始归顺之汗阿布勒班毕特孙也,嘉庆十四年嗣。又置王一,今曰江霍卓,阿布勒班毕特曾孙(阿布勒班毕特之长子曰博罗特,嗣为汗。其次子曰阿布勒必斯,别爵为王。有西部台吉巴喇克者,生子杭霍卓而卒,巴喇克之妻改适阿布勒必斯,因以杭霍卓为养子,朝廷命之嗣王爵。江霍卓则杭霍卓子也),嘉庆五年嗣。所辖色密斯奈曼及斯班奈曼诸鄂拓克,皆附塔尔巴哈台北。西部处极西(按,《土尔扈特部传》云:“土尔扈特屯牧额济勒河,所居地曰玛努托海,北界俄罗斯,南界哈萨克,东界哈喇哈尔榜,西界图里雅斯科,是哈萨克已近西海,盖即西部也”),无汗王,惟置二品以下台吉。	4/33	3/33A
35	其台吉托克托库楚克所辖者曰喀喇拜吉格特鄂拓克,佳拜所辖者曰克勒拜吉格特鄂拓克。乾隆三十七年至为西部矣。/即奈曼(色密斯奈曼、斯班奈曼总名曰奈曼鄂拓克)。	4/33	3/33A

36	阿拉克图古勒淖尔四源,东北源为额敏河, 漠北大山曰阿勒坦山,译言金山也。山顶极四十八度七分、西二十二度二分,其尾极四十六度五分、西二十度四分。元时太宗之孙昔里吉、脱忽、海都分地多在金山(《元史·土土哈传》:“至元十五年,大军北征,率钦察骁骑千人以从,追失烈吉,逾金山,擒札忽台等以献。二十九年,略地至金山,获海都之户三千余。”《刘哈刺八都鲁传》:“昔里吉叛,宗王别里铁木而奉命往征,帝谕哈刺八都鲁从行。师次金山,有使者云自脱忽王所来,愿得一见。王以为信,左右曰:诈也!脱忽所居要害,殆与昔里吉为耳目,愿勿听。遣兵窥之,脱忽方饮酣,进击,大败之。因获昔里吉所遣使,知其不为备,乘势进击,大破,擒之。”《玉哇失传》:“成宗在潜邸,帝以海都连年犯边,命出镇金山。”《月赤察儿传》:“金山南北,叛王海都、笃娃据之,不归正朔垂五十年,时入为寇。大德十年,叛王灭里铁木儿等屯金山。武宗帅师,出其不意,先逾金山,月赤察儿以诸军继往。月赤察儿奏曰:诸王秃苦灭本怀携贰,而察八儿游兵近境,叛党素无悛心。臣以为昔者笃娃先众请和,虽死,宜安抚其子款彻。又诸部既已归顺,宜处诸降人于金山之阳,吾军屯田金山之北。”按,昔里吉者,宪宗子,脱忽者,灭里大王之子,海都者,合失之子,皆太宗孙。脱忽分地在金山,而为昔里吉耳目。是昔里吉分地在金山西也。《宗室世系表》无笃娃之名,而海都、笃娃分据金山南北,疑笃娃即脱忽,特《宗室表》脱忽子无款彻耳。海都子察八儿游兵金山近境,则海都分地亦近金山矣)。山顶西南八百余里	2/17	4/7A
----	--	------	------

37	雅尔地在楚呼楚山西二百里,土尔扈特部旧居其额什尔努拉地。明崇祯时,土尔扈特和鄂拉勒克汗与绰罗斯交恶,越哈萨克,投俄罗斯,于喀山额济勒河之南、图理雅斯科之东马努托哈居焉。后为准噶尔伊克明阿特游牧云云(据余理初所辑)	3/9	4/9B
38	科布多城(《元史·武宗纪》:“大德四年八月,与海都军战于阔别列之地,败之。”姚燧撰《乞台普济先德碑》:“成宗诏皇上抚军漠北,以辅导之扈从,壹是军务,悉听于公。寇出金山南阔别列,子也儿吉尼将左卫射士居颜行当寇骁将,手搏,斩其首。”〈按,阔别列之地在金山之南,即今之科布多也。阔科、别布皆双声,列、多音亦相近〉)西南二百余里	3/12	4/11B
39	又一百三十二载,当康熙二十五年,为察罕汗之末年。察罕汗名曰厄里克谢摩汗罗费赤。察罕汗死,无子,有一女曰票多尔厄里克谢耶费赤,素梟雄,习战斗,嗣父位,是为察罕三皮提里普尔汗。亦曰叩肯汗,其国言男曰叩,女曰叩肯也。上距依番瓦什里鱼赤,凡二十四代(按,自是其国世传于女,至乾隆五十六年为第七传扣肯汗。嘉庆十年,遣使来边,其时复为男汗),扣肯汗遣使索取(云云)(此条据余理初所辑,存以俟考)	3/23	4/23A 此条与刻本异
40	注“名曰柏兴”：“按,斯科者,若中国省治府城,柏兴若县治。”“按,柏兴为拜牲之讹”句,删。	3/23	4/23A 刻本未用
41	又东北流,过铿格尔图喇。(此条接“驻兵五百名之后”) 额尔齐斯河既会布克图尔玛河,北流,有胡苏图水自东来入之。又东北,有乌兰斋水自东来入之,图鲁台水自西来入之。又东北,有一水	2/17	4/23B

自东来入之,乌达图水自西来入之。又东北,有乌里雅苏图水自东来入之,额贝图水自西来入之。又东北,有坤达图水自东来入之,阿海图水自西来入之。又东北,有一水自东来入之,乌里雅[苏]台水自西来入之。又东北,有布尔噶苏台水自东来入之,塔里袞水自西来入之。诸水皆细流也。额尔齐斯河又东北,迳铿格尔图喇之东。铿格尔图喇,俄罗斯小城也。极五十一度二十分、西三十三度四十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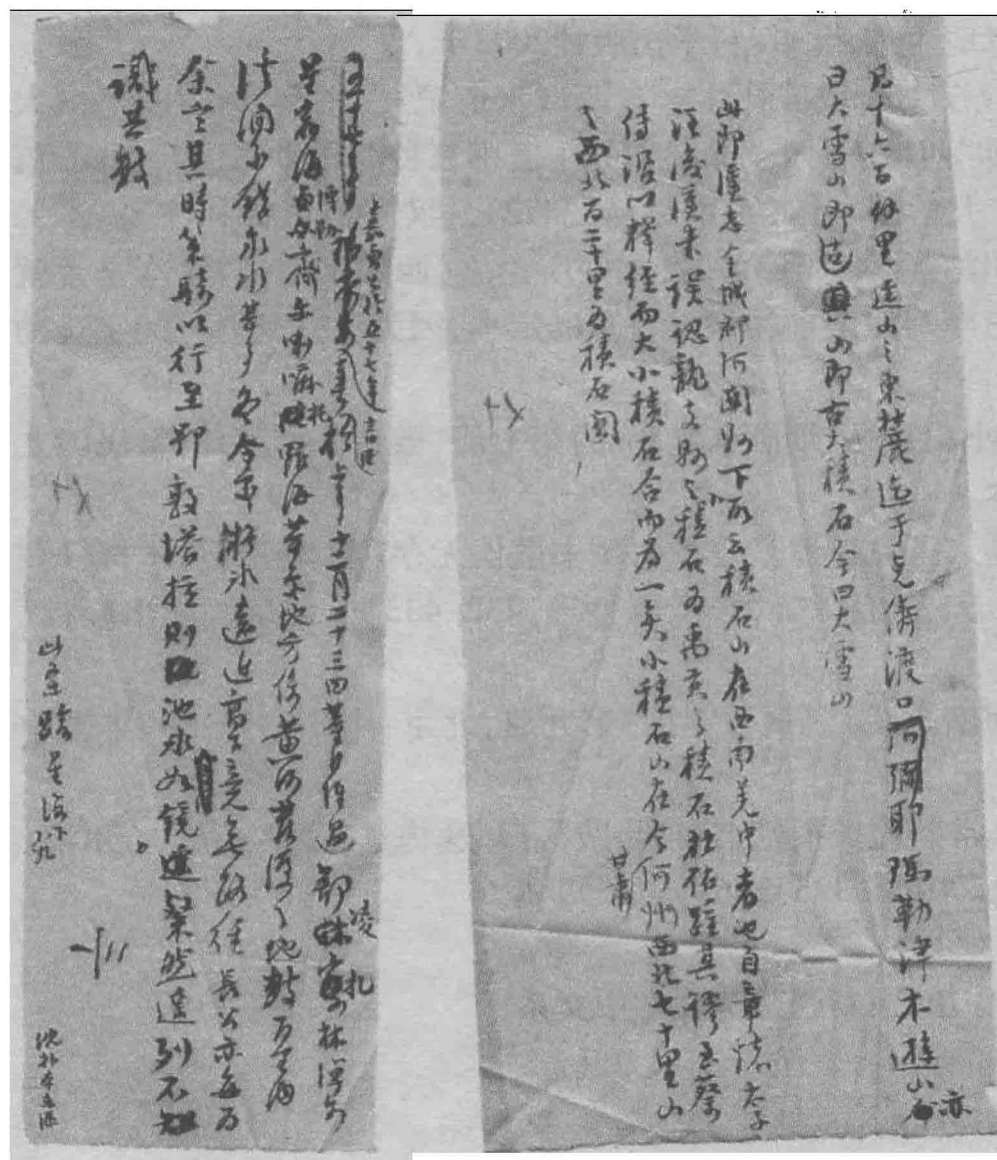
又东北流,过森博罗特城。

额尔齐斯河自铿格尔图喇东北流,有额布根水自西来汇。又东北,有图伦亢寄淖尔水自东经哈里尔之北来汇。又东北,有一水自东北来汇,阿布水自西来汇。又东北,有乌兰布拉克自西来汇。又东北,迳布里尔之东,有一水自东北来汇。又东北,有乌孙楚谦水自西来汇。又东北,有察罕鄂博水自东来汇。又东北,有察尔河自西南来汇。又东北,迳森博罗特城东,森博罗特城极五十三度三十分,西三十二度二十分,地距中国界已千余里。阿睦尔撒纳之窜也,实由斯以遁。定边右副将军兆公惠奏言:委署参领额林策等至俄罗斯森博罗特图喇,向玛玉尔查问阿睦尔撒纳踪迹,玛玉尔言,适据齐伦图喇报称有步行二人向刈草之人告云:我系阿睦尔撒纳,可报知尔头目前来渡我。其人即告知丕坦,遣人操舟前往,久未回报。复遣人往看,并无踪迹,惟于额尔齐斯河曲寻获渡口小舟,盖由此渡河以东矣。

又东北流,过达布逊淖尔。

额尔齐斯河自森博罗特城东北流,有一水自东来汇,折而西流数十里,包达布逊淖尔之北

	以至其东。淖尔极自五十四度二十五分至五十五度八分，西三十二度三十分。达布逊淖尔者，盐池也。康熙五十九年，俄罗斯使臣伊思迈罗付言：“我国之人今于盐池以南宰桑淖尔之处修建房屋居住。”乾隆二十年，参赞富公德奏言：“额尔齐斯之北有达布逊图喇地方，其地产盐。” 又东北，折而西北流，塔喇河注之。		
--	--	--	--



《西域水道记》稿本浮签

注: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307-308页。

②《西域水道记》刻印的时间,以往的研究多据卷前龙万育序文的写作时间,定于道光三年(1823),榎一雄最早纠正了这种错误,认为邓廷桢序文的署衔是判定其刊刻年代的标准,因而将该书的刻印推断在邓氏任两广总督的前期,即道光十五年未至十七年末之间(1835-1837),参榎一雄《徐松の西域调查について》初刊之《近代中国》14卷(1983年12月)148页,该文后收入《榎一雄著作集》第二卷“中央アジア史Ⅱ”,东京,汲古书院1992年10月,37-112页。据笔者最新的研究,则认为刻印时间当在道光十七年末至十九年末之间。参拙文《〈西域水道记〉:稿本、刻本、校补本》,载《中外关系史:新史料与新问题》论文集,荣新江、李孝聪主编,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③《新疆赋》、《汉书西域传补注》与《西域水道记》三书刻本往往合称《大兴徐氏三种》(或称“西域三种”、“徐星伯先生著书三种”)行世,其《新疆赋》稿本一卷,今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善本编号□472),《汉书西域传补注》稿本二卷,今藏国家图书馆(善本编号3972),此处所论之《西域水道记》稿本是否就是龙万育在道光三年写序之前为徐松誊写的定本,因为没有龙万育的字迹勘比,不能遽定。

④《星伯先生小集》,见《烟画东堂小品》第七册“徵卷”,缪荃孙辑,民国九年(1920)缪氏刻本。

⑤黄濬:《花随人圣盦摭遗》“袁漱六藏书散佚无存”条,转引自《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附录,李盛铎著,张玉范整理,432-43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

⑥缪荃孙:《河南志跋》,《藕香零拾》第九册,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影印本,235页。

⑦参郑逸梅《〈常熟翁氏捐献书目册〉跋》,《郑逸梅选集》第五卷,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325-326页。

作者工作单位: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